



2019冠状病毒疫情 深度

中国疾控人员口述：90%的人闲着，10%的人干活，还不知道要干啥

国内疫情都快结束了，我们每个小分队才刚刚明确成员名单；防控的60天里，这个所谓的“应急小分队”没有出动过一次。

特约撰稿人 褚心 发自北京 | 2020-03-28



2020年3月25日，辽宁省沈阳市，工作人员为将向公众开放的电影院喷洒消毒剂。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7日，美国新增确诊2019冠状病毒肺炎逾8万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全球首位。同一天，习近平与特朗普通电话，表示愿意分享防控与治疗经验，并竭尽所能提供援助。近两周来，中国官方通报的确诊病例数不断刷低，中国的疫情防控策略也从“防扩散”转变为“防输入”。

随着疫情趋缓，围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疾控中心”）的争议也渐渐冷却。端传媒采访了中国东北地区某疾控中心、有10逾年工作经验的中层干部王华（化名），请他谈谈过去两个多月抗疫行动中的经历和感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疫情上报是自下而上的——疾控中心要核实信息，并报告给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然而，即便在体系内部，依然会有瞒报情况出现。王华的工作，便是从下级疾控单位递上来的报告中找出这些“漏洞”，反馈给省级指挥部进行核查。同时，疾控体系长期以来存在的人浮于事、定位不清晰、不受重视等问题，也在疫情之下格外凸显。

以下是他的口述：

从大约两周前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从“防扩散”转为“防输入”。3月中，单位派了几位所长级疾控人员到北京，我们开玩笑说，基层员工没有补助不愿意干活，但是中层干部还是得有点责任感。

从疫情在全国扩散开始，国外就停了很多飞往中国的航班，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国际航班就更少了，北方地区的交通枢纽基本就只剩下北京。可想而知，北京机场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国外旅客落地北京之后，会由北京海关和疫情防控部门直接接管，进行登记隔离。但是有些乘客经北京中转后还要前往国内其他城市，这就需要各个省派代表到北京进行登记，掌握入境人员乘坐哪个航班或列车回到各省，再由各个省份对他进行隔离和疫情追踪（编者注：中国民航局等五部委22日发布公告称，3月23日零时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上海浦东、沈阳、西安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本文采访时，尚未发布这一公告）。



2020年2月29日，上海一个公车站播放着习近平的讲话片段。摄：Yifan Ding/Getty Images

在这之前，我们也请了高校公共卫生教授来做数学模型分析，将省内各地区分为高、中、低疫情地区。东北三省有很多人在日本、韩国旅居或打工，由于疫情发生，很多人会回国。我们省有两个地区虽然本地病例不多，但那里朝鲜族多，在韩旅居返乡的人能上千，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地区也提升为中风险地区。

坦白说，现在我才根据疫情划分为高、中、低地区，其实有些晚了，因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已经造成了低疫情地区的恐慌和严重的经济压力。如果某个地区一个传染源都没有，把人们都关家里，其实意义并不大；对于其他地区，如果过了2个潜伏期（28天）还没有新发病例，基本就很安全了。比如我们省，有几十个县根本没有疫情，就没必要去封锁，如果县域内的人可以随便行动，整个县域内的经济都可以正常开展。

流行病调查就是“破案”

与武汉不同，我们这里病例人数猛增，主要是因为聚集性病例。

东北人爱热闹，有个病例在外地感染后回到县城，一天都没消停，到处走动，县里的超市、电影院，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当地百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溜达鸡”，意思是散养的小野鸡，这件事已经成为我们本地人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最终，这个县城成为我们省感染人数最多的县城。

大约两周前，我们开始写疫情工作的总结报告，具体到每个人接触首个病例的时间、现存病例情况、聚集性案件的数量、出现发热等症状或者无症状的人有多少，计算潜伏期，这些都有不同小组的人在做，每组10-20人，所有人都要在3天之内把报告交上来。

我们有疫情监测科进行每日疫情分析，所有涉及到疫情的数据都是由他们提供，但是他们不会对疫情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估。因此，还会有专人负责具体的聚集性案例分析、死因监测、潜伏期研究等。

不过，疾控中心没有核查权，对下级疾控单位只有技术指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分析聚集性案例，梳理疑点，向省级指挥部提出建议，比如说通过住址发现这些人有高度聚集，具体情况还需要省级指挥部派督导去现场调查。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会在一张白板上写写画画，标上时间地点，用笔连线，看几个疑点之间有哪些联系。比如几位病例都提到坐某列火车，我们就会将所有坐这趟火车的病例都往上连，看是不是同一天，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再延伸，所有的聚集性案例都要像“破案”一样做详细梳理。

与“破案”不同的是，我们做流行病调查时只能询问病例的情况，很多病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一直不承认自己有接触史。比如同一小区同时出现多起家庭感染案例，这些家庭分散在不同单元的不同楼层，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们都说互相之间不认识，我们一度猜测他们是在电梯里感染的。

当时区疾控就弄不明白这个“案子”，到了我们这里仍然觉得非常棘手。不过，这种事情瞒得了上面，瞒不了下面。风声是从小区里走漏的，小区住户有人知道他们是亲戚，便向当地政府举报，最终由警方介入。我们想尽办法也没问出的真相，派出所刑侦人员只用半小时就搞定了，他们确实是亲戚。这个“案子”最终导致几百人被隔离，民警正在考虑对他们隐瞒病情的情形提起诉讼，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2020年2月22日，黑龙江哈尔滨市降雪，被积雪覆盖的车辆。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有时候，当地政府也会为了避免责任，选择隐瞒病例信息。有个案子里的病例实际上是在同一地点办公，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感染了，但是当地政府上报时要小心思，比如将阿拉伯数字改成汉字，使用小区的简称而非全称，或者只报告病例各自的住址，而没有报告病例的办公地址，让这些病例间很难体现出共同的联系。

一旦出现病例，卫生部门的领导就要出来“背锅”，所以大家遇到情况都会先压下来。

几个同事最后是用手机地图发现了“马脚”。这个小区有100多栋楼，病例集中在某几栋楼，我们在地图上发现，这几栋楼其实是挨着的，最终我们通过定位发现，这些病例都在小区的某栋楼上班，但是报告上呈现的地址却很分散。

我们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当地政府直接干预医生报卡，通知他们只报住址、不报工作地址。因为一个大规模疫情被披露出来，至少是一个区长或者市长下台，所以当地政府会通过各种关系干预上报。

前几天，我在新闻上看到，辽宁省丹东市一个县出现了输入性病例，当地卫健局党委书记被免职。我心里挺替他喊冤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疫情在本地扩散，输入性病例谁都预料不到。一旦出现病例，卫生部门的领导就要出来“背锅”，所以大家遇到情况都会先压下来。

别说是县里了，省级疾控中心都没几个人会写流行病报告，大量非医学、公共卫生出身的人员挤占了编制名额，削弱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

即便是市、县疾控部门交的流行病调查报告，我们同样需要反复核实。一方面，是基层疾控人员专业能力不强，工作不规范。按照标准要求，我们是要求病例基本信息必须是人名加身份证号，但是县里写的是小玉、二姨、大祥，你让我怎么查？

一个县级的公共卫生人员，本身学历不高，也没有流行病学的基础，甚至十几年里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让他们做完流行病调查后写一份报告，我们再从他的报告里抽丝剥茧，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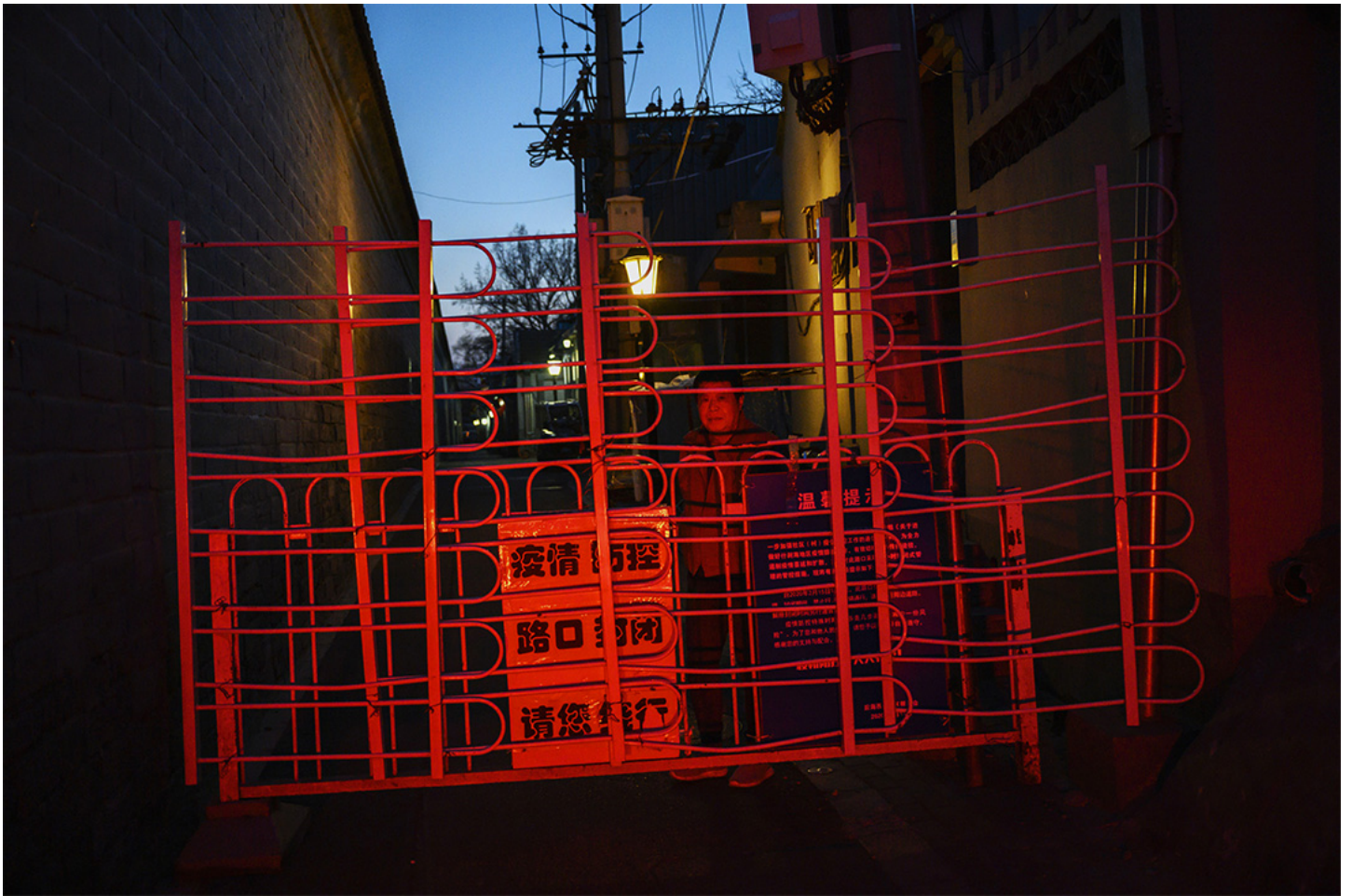
别说是县里了，省级疾控中心都没几个人会写流行病报告，大量非医学、公共卫生出身的人员挤占了编制名额，削弱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尤其是在事业单位改革以后，原先独立的各个疾病预防控制所合并到疾控中心，看上去人员队伍是壮大了，但是半数以上人员都是财务、后勤、办公室等非技术部门。而且我们没有淘汰机制，事业单位就是“铁饭碗”，你进来后即便不做事也可以一直干到退休。这次疫情也算是一个阵痛吧，希望未来疾控体系真的能有一些改革，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声音能够发出、能够被重视。

在疫情防控的60天，这个所谓的“应急小分队”没有出动过一次

回想起来，我还是有职业敏感性的。

1月10日，我就买了一批医用N95口罩，有100多个，消毒液是整箱整箱地买，我觉得这些防护用品日后肯定会成为稀缺物资，马上要到春节了，拿出去送礼，别人也会觉得你比较有心意。考虑到我和我爱人的工作性质，我还买了10套防护服，这些东西我们平时也会用得到，她是感染科医生，专门出发热门诊的。

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疫情期间，符合医用标准的口罩，只有实验室的一线人员才能用到，我们后方人员往往拿到的都是一些质量不合格的次品或者外界捐赠的普通口罩。



2020年3月15日北京，在防止外人进入胡同的路障内有一个不戴口罩的居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1月23日，我就听说多地疾控紧急通知春节不休了。一般情况下，应对这种传染病疫情，消毒所、病毒所、传染病所、应急办是主力，我是负责慢性传染病的，暂时还不用上班。

1月25日，单位来了紧急通知，让全员回疾控中心上班，我上午收拾完东西，下午就到单位报到了。此前，我把孩子送到了农村老家，留给父母帮忙照顾。按照以往，我可能会去各个医院检查感染控制，不过这次具体还是要看分到哪个组。

很快，我们所向中心领导递交了《请战书》，随时待命前往疫区战场，所里十多名国家应急队成员都在上面按了红手印，看着还是挺神圣的。这种时候，共产党员都必须签请愿书，特别是我们中层干部一定要做出表率。

有时候市级疾控都没搞明白，很难想像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是怎样的。

从春节前开始，国家疾控中心就会通过疾控内部的软硬件系统，向全国各省疾控中心同步介绍新的方案、以及最新的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导，等到会议结束后，国家疾控中心也会把录制的会议视频传到系统上，其他人在家自己学习。国家疾控中心给省级开完后，省级再给市级开视频会，这个会议系统也只支持到市疾控。以前省级还能直接到县里考察，现在只能先给市里培训，市级再给区级、县级培训。有时候市级都没搞明白，很难想像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是怎样的。

对于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并没有应急预案（[点击了解中国应急系统为何不应急](#)），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在等着领导安排，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防控。

从一开始，省卫健委就明确要成立十几个“肺炎疫情防控救治应急小分队”，每个小组都会有来自医院、疾控中心、急救中心的成员。根据相关文件，“小分队”的职能包括，参与组织省市医疗救治、医院安全感染控制、流行病学调查等专业培训，指导各地开展疫情监测调查处置、实验室建设技术等等。

但直到3月份，国内疫情都快结束了，我们每个小分队才刚刚明确有哪些成员名单，在整个疫情防控的60天，这个所谓的“应急小分队”没有出动过一次。

没有真正做到各司其职，也是这次疾控遇到的很大问题。现在中心90%的人都闲着，只有10%的人在干活，而且还不知道要干啥，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体制。

医务、公安、社区、媒体都算一线防控人员，而疾控不算

其实，我对疾控这份职业还是有一种敬畏的，虽然薪资待遇确实比较低。2005年左右，我放弃了20万的年薪，从一家药企来到省疾控工作，因为编制名额紧缩，当时还是找关系、交了钱才进来的。

我的职称属于副高级职称，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但我现在拿的卫生津贴标准，还是30年前的标准。以前，如果我每天冒着比别人更高的风险，去面对耐药患者，到实验室对这些高致病性的细菌进行检测，一天也就多拿7元钱。现在是大锅饭，不管我再这么加班，再怎么去实验室，都只能拿固定薪水。

当孩子班主任听说我们的工资，准备组织给我捐款，我跟老师说，请给我留下最后的一点尊严吧。

我刚刚上班时，工资是896元/月，现在月薪4000元左右，还是我熬了10多年熬到的。据我所知，现在刚上班的月薪大概3100-3200元/月。当孩子班主任听说我们的工资，准备组织给我捐款，我跟老师说，请给我留下最后的一点尊严吧。



2020年2月12日，北京一条空旷的商业街上，一名戴着防护口罩的工人正被检测体温。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前段时间，中央出台了疫情防控补助的文件，一线人员补助300元，其他防疫人员200元。但这个名单里不包括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后方忙了2个月，不被认为是疫情防控人员，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公安有补助，社区工作人员有补助，他们都是防疫英雄，疾控人员却不算。疾控中心不是几个流行病调查员去了现场就能干的，也需要后方进行态势分析和风险评估，但我们幕后人员被遗忘了。

医务、公安、社区、媒体都算一线人员，而疾控在大家眼里不算，这或许就是社会对于疾控认识的缩影吧。

一直以来，整体的宣传论调都是“重治轻防”，站出来发声的是临床大咖，被称为“最美逆行者”的也是医务人员。前几天，我看到一家少儿教育机构也发起了针对疫情工作人员的优惠活动，海报上写着，“父母一方为支援武汉防疫一线医护工作者，享学费5折；父母一方为本市一线医护人员、公安交警、新闻媒体防疫工作者，享学费7折”。医务、公安、社区、媒体都算一线人员，而疾控在大家眼里不算，这或许就是社会对于疾控认识的缩影吧。

仔细想想，这次疫情，疾控中心确实没有发出太多声音。在国家疾控中心的视频会议上，有人问高福，疾控中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连高福也回答不了。他只是略带感伤地简单说了一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真的，从中疾控到各个省疾控，你到底在干嘛？

如果疾控中心没有论文、没有科研的话，那谁来发布疾病防控的相关方案，如何部署防护措施，而且我们的工作职责当中，有一项就是“组织制定公共卫生技术方案和指南”（编者注：1月底，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在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示2019冠状病毒在12月下旬就已出现人传人现象，遭到社会质疑：中国疾控中心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点击阅读[《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尽管发表论文是中疾控进职称的硬性指标，但由于编制名额缩减，很多地方要求自然减员，因此疾控并没有太多发表论文的压力。我原本想申请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的课题研究，但是省政府不愿意投入经费，这件事只好作罢。

这段时间，社会对于疾控改革的讨论也比较热，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是赋予疾控中心行政权力。现在各类文件都是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名义发布，但是指挥部根本就不是一个法人单位，原则上也没有疫情发布的权力。确切来说，这类疫情数据信息、疫情防控文件，理论上完全可以由疾控中心来发布，政府进行审核。不过换个角度想，这次没有让疾控中心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对于疾控中心也是一种保护，如果将这些事情全部交给疾控，那么所有的社会矛头都会指向疾控中心。

对于我来说，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爱人现在还奋战在临床一线，只要省内还有住院病人，他们的工作就还不算胜利。自从大年初一从老家返回单位后，我就没见过两个孩子，班主任知道我们夫妻俩都站在疫情防控一线，晚上会打电话给孩子做心理辅导。我现在大概3天给孩子打一次电话，不敢多打，怕孩子们想我。我们的情况反而是班主任跟孩子说的多些，老大知道“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爸爸妈妈都在一线工作”。

2019冠状病毒疫情

中国疾控中心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热门头条

1.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和政策都不鼓励民众戴口罩？
2. 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3. 专访香港名医黎青龙：2019之后，香港人有口难言
4. 疫区爱欲自述：大瘟疫时代的约炮
5. 离开难、留下更难：进退维谷的中国留学生
6. 疫情或比金融危机可怕，美国经济能避免衰退吗？
7. 欧洲疫情下的老人：隐形的病毒，让孤独加重，让死亡更近
8. 走进不招待普通话的餐厅：对话，痛苦与身份的挣扎
9. 现场：纽约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版的武汉”？
10. 我离开了被“缓慢”疫情笼罩的英国

编辑推荐

1. 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三地如何尝试压低疫情曲线？
2. 同婚之后、外遇之前：台湾离通奸除罪化还有多远？
3. 在中国遇见“缅佣”和“菲佣”：她们有时不合法、有时不违法
4. 這個機構與香港骨肉相連——專訪港台前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
5. 现场：纽约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版的武汉”？

6. 郭婷：恶在细水长流处——日常暴力与“N号房”
7. 大卫·哈维：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8. 香子兰的一万种可能：游戏模组的故事
9. 专访陈传兴：让摄影还是摄影，不是现实或意识形态的佐证
10. 《狂飙一梦》导演廖建华：革命可以告别吗？寻找历史缝隙里不被记得的人

延伸阅读

中国农村防疫故事：打麻将的要逮，不服从的按倒

李跃鹏治好回来了，可他成了村里的瘟神，他上哪儿，就有哪儿的热心村民打电话向干部举报。现在李跃鹏又被拉回隔离了。

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自信叙事被广泛认可，也意味着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哈尔滨疫症日记：告别从前的生活或者什么都没变

但我还是崩溃了，各种谎言，恶心和屈辱让我无法呼吸。

疫情预警迟到，谁在推卸责任？

从地方政府到疾控中心，武汉疫情见证了一场“击鼓传锅”的责任分卸。